
重庆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余建荣¹

(重庆文理学院科技部, 重庆永川 402160)

【摘要】重庆是在古代江州城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巴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重要源头, 构成了重庆城市文化重要的人文传统。基于地貌特征形成的“江-山”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自然传统。重庆城市文化在几千年的变迁过程中, 逐步完成了传统与更新、古老与现代的交替, 实现了从旧到新的涅槃和更生。在这一转换过程中, 移民活动和近代化是重庆城市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巨变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重庆; 城市文化; 传统; 变迁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04 (2011) 06-0132-04

城市文化从城市诞生起, 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原有基础上不断积淀和发展而形成。城市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城市发展脉络, 有着多重内涵和表现形式。一座城市能够延续和发展, 越来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延续。城市不仅体现着它所具有的物质功能, 而且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 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重庆是在古代江州城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公元前 316 年, 张仪筑江州城, 重庆开始了城市建设, 其后数易其名, 而重庆之得名, 则在南宋淳熙十六年 (1189), 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重庆依山傍水, 既是山城又是江城, 有独具的风韵和特色。它以巨大的魅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产生凝聚力量, 使自己成为古代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商业物资集散地; 近代逐步成为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商埠; 现代发展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是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它集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碰撞。

一

巴文化无疑是重庆城市文化的重要源头, 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巴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 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西南有巴国, 大暍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 “西南有巴国, 有黑蛇, 青首, 食象。”《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 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 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 居山上, 在丹山西, 丹山在丹阳南, 丹阳, 居属也。”

据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研究, 大约原始社会末期, 巴民族和巴文化产生了, “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 最终以重庆为中心, 建立了巴国, 逐步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 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 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流。

¹收稿日期: 2011-04-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化遗产视野下的重庆城市文化研究 (项目号: 2010QNRW60)”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余建荣 (1976-), 男, 讲师, 文学硕士,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化遗产研究。

大约公元前 316 年,秦国灭巴国,大批巴人纷纷进入长江以南的武陵山区。表面看来,一个强大的巴族消失了,出现了所谓的“巴人之谜”。其实巴族以另一个形式出现了,大约在唐、宋时期,巴人逐渐融入了武陵山中的原住民等族群,并加上从江西迁来的汉人等,逐步完成转型,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土家族”。

因此可以说,现代重庆城市文化中流淌着土家族文化的因子。巴文化的基本民族性格是崇力尚武,它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融合统一的人文精神。巴文化的这种民族性格使得巴人始终具有勇于斗争、勇于反抗、不畏强暴和不惧艰难险阻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气质,像一根红线维系着巴人的繁衍和发展。

巴人是一个居住在水边的民族,是一个崇尚船依赖船的民族。他们死后,又用船作为葬具,或仿其形且加盖作葬具,考古学上称之为船棺葬。生活在高山大川的他们,面对的是滔滔江水,如削绝壁。险恶的生存环境离开了船,就像人失去了腿,寸步难行。船是他们创立家业、联系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从船棺葬我们可以看出:巴人跟船结下的是生死缘,生生死死都不离船。从另一方面看,船棺葬又展示了巴人与众不同的生死观。

史料记载:巴人是一个尊祖爱国、重义轻死的民族。三峡滩多水险,翻船死人寻常事。死亡,对许多人来说,是件非常可怕的事。但巴人却把它看得很淡。人死了,装进棺材,葬在悬崖峭壁上,那样子看上去简直是在炫耀死亡。在巴人眼里,生命是轮回的,死后便是生。直到今天,巴人的后裔土家族还保持着先民的习俗。人死后,他们围着棺材通宵达旦地跳撒尔嗬,伴以动作,唱词中不时出现嘲笑死神的句子。

巴人住所是一种可称之“干栏”式的建筑,这种建筑分上下两层,竹木结构,上层居住着人,下层用底架支撑,这样的结构自有它的好处,一方面可以防御南方地区的潮湿,另一方面又可避虫蛇之扰。这种建筑特征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当下的重庆,我们还能看到这种风格的建筑。

巴文化绚丽多彩,现实与浪漫交织于一体。由于面临着恶劣的生活环境,基于生存的需要,巴文化中天然蕴含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成分。因为他们赋奇特幻想于神秘的自然,使得巴文化成分中又有瑰丽浪漫的神奇色彩。

著名的古曲《下里》《巴人》,来源于巴地的民歌,充分说明了巴文化是一种具有世俗精神的大众文化。而源于巴渝地区的竹枝歌、竹枝词,描绘风土人情,本身也就是俗文化与雅文化交融互摄的一种文学形式。

巴文化在与外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博采众长,在继承的基础上引进、融合和创新,如土家族民间祭祀舞蹈《跳丧舞》,就源于古代巴人的《踏歌舞》。

二

在对重庆城市文化的历史描述中,人们往往只注意两头,即要么是指向巴文化,要么是指向当代城市文化,但是只有建立起巴文化和重庆当代城市文化之间的内在脉络,才能揭示出巴文化和重庆城市文化的密切关系。

重庆城市文化正是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完成了传统与更新、古老与现代的交替,实现了从旧到新的涅槃和更生。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移民活动和近代化尤为重要,他们是重庆城市文化从前世向今生巨变的重要因素。

1. 移民活动

重庆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对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重庆移民史中,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移民活动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

经过明末数十年战乱，清初四川人口凋零。清朝于顺治末年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此后出现了持续不断迁居四川的移民浪潮，前后延续 60 余年之久。这次大规模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移民的数量，使四川人口从清初的 50 万人，增加到 1724 年移民浪潮进入尾声时的 204.66 万人，为原有人口基数的两倍有余。

重庆在这次移民潮中，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促成了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发生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情况；也让重庆的经济作物出现多样化，种植技术得到显著提高，另外，大量的商业移民也促成了重庆成为一座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

第二次是发生在抗战时期

1937 年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设立陪都，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移，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有关统计：西南各省自 1937 年 10 月到 1941 年大约接收移民 1000-2000 万人。重庆市区人口由 1937 年的 47 万，飙升到 1946 年的 125 万^[1]。在这次的移民队伍中，人们最习惯提到“下江人”这个词，所谓“下江人”，即是从长江中下游诸省区迁来的移民。

自民国以来，重庆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相对封闭状态，重庆“本地人”与“下江人”似乎代表着“传统内陆乡村”与“现代都市”。“下江人”群体在抗战时期快速壮大，所带来的与现代化、工业化等直接联系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对于老重庆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重庆向现代都市转型。

第三次是“三线建设”移民

上世纪 60 年代，因为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为防止新中国的新兴工业基础遭到破坏，国家计划性地将之向内地迁移。这次内迁主要以军工业、新兴科技为主。迁出地大多是东北、沿海一带的工业企业，大批技术人员、劳动力及其家属也蜂拥而至，迁入重庆的人口约十多万。这次移民为重庆带来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和技术人员，可以说奠定了重庆作为重要工业城市的基础。

历次移民，使得重庆的人口构成状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本土居民的比例逐渐下降。而伴随着大规模迁入人口以及其带来的原居住地的文化习俗，使重庆本土的文化生态在历次移民后都会发生变迁。

在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混杂过程中，一方面，外来文化冲击着巴文化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重庆的本土文化也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所以当下的重庆城市文化图景，并非单一文化源头所造就，而是多种文化融汇的结果。

2. 近代化

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启动是从商业化开始的，然后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重庆自 1891 年开埠以来，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了重庆城市新的发展阶段。川江航运的开辟与贸易的繁荣使重庆与长江中下游的惟一“黄金水道”优势凸现，促进重庆“向东”发展。

重庆与“下江”地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为长江中下游物质文明的传入打开了通道。“开埠通商使重庆这个古老的城市破天荒地受到来自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猛烈冲击，在极其被动的局势下，重庆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2] 隗瀛涛曾经指出，重庆作为西部的龙头，是长江上游城市近代化的起点，如果重庆不实现近代化，西南地区的其他城市就无法完成近代化，长江流域也

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城市带和经济带，进而无法完成中国的近代化。

近代的重庆为祖国奉献了灿烂的文化，也为自己打造了崇高的精神^[3]。从19世纪末期以来的城市近代化历程加强了重庆与沿海乃至世界的贸易联系，开埠以后，重庆的工业才开始缓慢起步，并在民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增长；到抗战时期，重庆才最终完成近代化的任务。

在近代重庆的崛起中，两个重要因素是关键：一个是“内部合力”，即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形成的近代“海派”文化之“西进”；另一个是“外部借力”，即以近代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西学”之“东渐”。

这两种因素与重庆传统文化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内陆城市文化，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还给以豪放和阳刚之气为特征的重庆文化更多的理性、睿智和现代色彩，从而造就了现代的重庆人，使重庆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领导着中国西部的思想潮流^[3]。

近代重庆从“开埠”“设市”到“陪都”的历史，一方面是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近代化向内陆腹地深化的过程，是区域城市近代化的过程。延续百年的近代重庆城市文化构成重庆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底蕴^[4]。

三

历史悠久的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其全城依山而构，临江而筑，市内坡峭路陡，楼房重叠错落，山和城融为一体，有“山城”之称；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重庆雾多，又素有“雾都”称号。这些别称和美誉是重庆城市的客观表现和真实写照，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他们是重庆城市文化深厚历史积淀的载体，是重庆重要的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这是重庆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

很多专家在探讨重庆的传统文化时，经常会冠之以“巴渝文化”，实际上当代重庆人主体构成并非上古巴人嫡传后裔，仅在地缘上可称之为巴人之后。经历几千年的变迁发展，在当代社会，巴文化的原始面目已含混不清了，作为其演变结果的重庆城市文化与巴文化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但在当下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巴文化的流变踪迹。对于重庆城市文化建设而言，在“中华文化”的总名之下，通过探究梳理找到重庆城市文化独有的文化特质，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时至今日，除考古发现外，巴文化的实物载体已经难以找寻，巴文化的当代形态应该说更多地体现在土家族文化形态中。

从文化地域来看，重庆是巴文化的核心活动区，也应当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从当前重庆尚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找寻非物态存在的以巴文化为主的各种文化遗存，当是对重庆城市文化特色进行发掘与认知、重塑与营造的重要路径。

明末清初以来，重庆挟两江之利，又经历了几次大的外来移民，重庆城市文化逐渐产生了新的特质，可以概括为移民文化和码头文化的混合体，这种文化具有尚武争雄、质朴务实、耿直仗义、豁达通脱等优点。当然这种文化也有它的劣处，在文化建设时就需要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1] 周勇. 重庆抗战史（1931~1945）[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2] 张瑾. 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3] 周勇. 重庆通史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2.

[4] 刘帮凡, 蒲雪峰. “重庆学”研究管见 [J]. 重庆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09 (1).